

文章编号:1002-980X(2006)11-0017-04

以公平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黄邦根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41)

摘要: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收入的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为公平会损害效率,并降低资本积累率。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主要来源于效率以外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经济引起的垄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等等。消除这些因素,不仅可以增加公平,而且也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公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关键词:公平;效率;经济增长;垄断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一、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 公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公平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在经济学中,公平主要是指收入的均等分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解释“Equity”即“公平”辞条时指出,“‘公平’取决于用户的倾向,人们几乎可以对它做出任何解释。本文将采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沿用的公平含义,它接近于均等或公正的意思。”^[1]¹⁹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尽管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都会增加社会福利,但公平与经济增长常常是负相关的。公平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旨在增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第二,提高公平程度,会降低社会储蓄倾向,减少投资,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2]。

(一)旨在增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按要素贡献来分配。假定厂商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要素生产的产品数量为 Q ,产品的价格为 P ,并用 MP 表示某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PQ = P \cdot MP_L \cdot L + P \cdot MP_K \cdot K \quad (1)$$

(1)式表示总收入(PQ)是由各种要素共同创造的,

并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各种要素投入量的多少及其边际产量或边际生产力的高低)进行分配。

由于各个经济主体所提供的要素的数量不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不同,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为了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政府常常通过征税途径,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但这种做法,往往损害效率。

首先,它会影响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热情。对人们的工作、储蓄征税,必然相对降低休闲和消费的机会成本,鼓励人们多休闲和多消费,减少工作和储蓄;根据一定的收入标准以最低生活保障金形式给予穷人的救济,使受救济者面临极高的边际税率,几乎失去积极工作增加收入的努力;对投资所得征税,实质上就是提高了投资成本,使得厂商原先愿意进行投资的某些项目,现在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而不愿进行投资了,最终必然减少社会投资及其正的“溢出”效应。其次,征税和进行转移支付,需要一定的人员或机构去办理,会花费一定的费用,即存在“奥肯漏桶”:将1元收入以所得税的形式从富人的桶里转移到穷人的桶里时,桶里有一个漏洞,使得穷人实际所得到的收入总是小于1元。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而公平常常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得实际产出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低于潜在产出。因此,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一味的强

收稿日期:2006-08-12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资助项目(2005sk083)

作者简介:黄邦根(1962—),男,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分配理论研究。

调公平,必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 提高公平程度,会降低社会储蓄倾向,减少投资,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凯恩斯认为,个人消费主要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消费总量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即消费倾向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凯恩斯关于消费函数的这种假说,虽然与长期的经验数据不一致,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不太正确,曾受到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批评,但它较好地解释了某一时点上的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倾向越低的现象,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空间的横截面分析上,还是适用的。储蓄是消费的反面。在短期,受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储蓄倾向总是低于收入分配比较不公平社会的储蓄倾向。

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认为储蓄总是等于投资。这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将利息看成是节俭的报酬,利率越高,人们就越愿意以未来消费替代现时消费。因此,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储蓄流量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故资本供给与利率正相关。在古典模型中,对资本品的支出代表着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即投资就是资本的需求。投资取决于预期收益率与利率两个因素。在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既定时,利率越低,投资的成本就越低,从而投资就越多,即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资本需求与利率负相关。在资本市场上,具有灵活性或弹性的利率保证了资本供求相等,即保证了储蓄与投资的相等。显然,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储蓄会全部转化为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最终增加潜在产出。

既然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消费倾向,或者说富人的储蓄倾向高于穷人的储蓄倾向,且储蓄总是等于投资,那么,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必然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倾向或积累率,减少社会投资,进而延缓潜在产出的增长速度。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公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观点,建立在社会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平等的机会、明晰的产权、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和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假定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假定条件,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一定是负相关的,而且很可能是正相关的。实际上,公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负相关还是正相关,取

决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

二、我国目前公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原因

目前,我国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这个国际警戒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表面上看,这种现象符合公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观点,其实不然。因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主要不是来源于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来源于政府干预经济导致的垄断、产权不明晰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等因素。而我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的不断增长,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提高引起的私人储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私人投资增加。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提高,由于没有相应地增加私人投资,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3]。公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一) 政府干预经济引起的垄断,不仅减少有效产出,降低效率,而且提高不公平程度

与竞争市场相比较,垄断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低。垄断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垄断条件下,垄断厂商均衡时的产品价格大于产品的边际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产品生产太少,使得任何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相等,导致生产与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无法实现,减少了社会福利。当然,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垄断和由企业家“创新”引起的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可以看成是社会为经济发展所支付的成本。至于其他形式的垄断,对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益处。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大多数垄断,都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引起的。这种垄断不仅降低经济效率,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加剧不公平:首先,垄断厂商的利润和垄断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大大地高于非垄断厂商的利润和非垄断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其次,垄断厂商的产品价格较高,减少了穷人的实际收入,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二) 产权不明晰引起不公平和低效率同时并存
产权不明晰引起的不公平和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产权不明晰,国有企业的资产在改制

过程中大量流落到少数人手上。在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即使在产权关系明确的条件下,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相互订立的契约是不完备的,在契约的履行过程中,常常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更何况在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由于委托人缺乏选择、激励、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能力和动力,将产生更多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不仅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加剧企业领导与职工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

其次,由于政府没有出台和实施物权法,法律对个人的产权和利益保护不力,不仅使假冒伪劣之产品充斥市场,坑蒙拐骗盛行,而且使一部分富人宁愿将资金窖藏闲置或转移到国外赚取很低的利息收入,也不愿进行国内投资,获得较高的利润收入,个人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不能转化为私人投资。其结果是社会福利减少,不公平程度提高,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减慢。

(三)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引起的不公平和低效率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指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下降。恩格尔定律意味着人们对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1156]。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不仅会相对减少,而且会绝对减少,人口将从农村流向城市。如果这些调整进行得不够及时,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就会低于非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不仅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而且影响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过程中,除了农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地进入城市定居和工作,政府还常常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从农村转入城市,以便在实现工业化、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而我国的户籍制度牢牢地将农民锁定在农村,不仅不帮助农民从农村转入城市,还非常有效地限制农民转入城市,使得我国不能彻底地实现工业化以加速经济增长,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建立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制造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教育、卫生保健、失业救济和老年生活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农村大量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贫乏,拥

有的生产技能较低,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人力资本积累较少,最终必然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鉴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公平之间的正相关性,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必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提高公平程度,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稳固基础上

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投资和出口增加带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投资和干预将大大减少。而汇率的合理化要求本币不断升值,依靠大量出口自主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较少的且价格低廉的产品来维持的贸易顺差也将不断减少。鉴于我国目前个人储蓄率较高,而私人投资率偏低,的局面,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为了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我国政府必须在鼓励私人投资的基础上,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以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的稳固基础上。这一点,可以通过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假定,社会成员分为工资收入者和利润收入者,二者的储蓄倾向既定,且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为:

$$Y = W + P \quad (2)$$

$$S = s_p P + s_w W = I \quad (3)$$

(2)式中的 Y 为国民收入, W 为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 P 为利润总额(资本收入);(3)式中的 S 为储蓄总额, s_p 为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 s_w 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率, I 为投资总量。

如果将(2)式写成 $S = s_p P + s_w (Y - P)$,并在该式两端同除以 Y ,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

$$s = \frac{S}{Y} = \frac{P}{Y} (s_p - s_w) + s_w \quad (4)$$

将(4)式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 $G_w = \frac{s}{v}$,得到:

$$G_w = \frac{s}{v} = \frac{P}{Y} (s_p - s_w) \frac{1}{v} + \frac{s_w}{v} \quad (5)$$

令 $v = \frac{K}{Y}$,并代入(5)式后,则有: $G_w = \frac{P}{Y} (s_p -$

$$s_w) \frac{Y}{K} + \frac{s_w}{v} = \frac{P}{K} (s_p - s_w) + \frac{s_w}{v} = p (s_p - s_w) + \frac{s_w}{v} \quad (6)$$

(6) 式中的 p 为利润率, 即: $p = \frac{P}{K}$ 。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表明, 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要沿着充分就业轨迹增长, 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即收入分配必须合理化, 以保证社会一定积累率(储蓄率)的实现。在经济发生波动时, 收入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均衡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4]

例如, 假定自然增长率等于 $G_n = \frac{s}{v} = 3\%$, $v = 5$, 则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 $s = 15\%$ 。

若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s_p 为 30% , 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s_w 为 5% ,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 80% , 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为 20% , 则全社会的储蓄率为 $s = 80\% \cdot 30\% + 20\% \cdot 5\% = 25\%$, 大于均衡储蓄率 $s = 15\%$, 从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G = \frac{s}{v} = \frac{25\%}{5} = 5\%$, 大于自然增长率。

新剑桥学派认为, 在社会储蓄率较高, 实际经济增长率过高, 大于自然增长率时, 只要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到 40% , 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

$$s = 40\% \cdot 30\% + 60\% \cdot 5\% = 15\%$$

就可以使实际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 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二) 提高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途径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与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并存的情况, 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 既不和谐, 也不可持续。鉴于我国目前公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现实,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必须从多个方面努力, 切实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第一,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步伐, 取消户籍制度,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 以保证我国的全体公民都能够在全国各地不受歧视地自由迁

移、定居和工作, 使全体公民真正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 实现机会均等, 消除因身份、地区和行业性质等因素不同引起的收入差异。

第二,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 鼓励自由竞争, 控制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 以提高经济效率, 消除或者减少垄断利润, 增加消费者剩余。

第三, 加快以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 处理好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以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提高改革的公平程度。

第四,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增加重要决策和财政收支的透明度, 减少行政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第五,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平等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 不仅可以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而且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促进经济增长。当前, 特别要增加对穷困农民的直接财政补贴, 大力增加财政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投入, 从根本上改变多数农民的贫穷面貌。

第六, 完善税收制度, 使税收制度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当前尤其要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以减少由起点不公平引起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第七,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制建设, 严厉打击经济生活中各种损人利己的欺诈行径, 切实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利益, 使经济主体最大化私人利益的行为, 在市场机制的指引下, 能够极大地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 [1] 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2) [M].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 [2]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 [M]. 第17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319—321.
- [3] 赵艳. 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J]. 沈阳干部学刊, 2005(2): 22—23.
- [4] 赵红梅, 李景霞.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77—79.

Promoting Persist Growth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by Impartiality

HUANG Bang-gen

(Economy and Finance Department i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Trade, Bengbu Anhui 233041, China)

Abstract: Mainstream economists think impartiality distribute of income and economy growth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cause impartiality may damage efficiency and reduce capital accumulation rate. But partiality distribute of income of our country mainly root in the factors such as monopoly rising of government intervene economy, prediction of a person's luck in a given year of nation owned capital and irrational door roll system except efficiency. If clear up these factors, it will increase impartiality and enhance economy efficiency, and then promote economy growth. So impartiality and economy growth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we must increase impartiality degree of income distribute to promote persist growth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Key words: impartiality; efficiency; economy growth; monopoly